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自觉

李 白 鹤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哲学院,武汉 430073)

摘　要: 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自觉中,他们对建立时代性和民族性兼具的现代新文化的自觉以及关于新文化建设的“中国化”思路的形成,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时的重要思想文化背景,并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形成和确立奠定了重要基础。此时,在中国本位文化论战的启示下,在对新启蒙运动的倡导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逐渐认识到,“中国现代新文化”应既具有突出的时代性,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在对“如何建立既具时代性又具民族性的中国现代新文化”这一问题的思考中,他们逐渐形成了关于新文化建设的“中国化”的思路:既不顽固守旧,又不盲目崇洋;既兼顾古今中外又强调批判地吸收,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建立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民族性的中国现代新文化。

关键词: 中国本位文化论战;新启蒙运动;中国现代新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B 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17)05-0015-08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①20 世纪上半期,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指引中国自主自强的革命实践中,中国新文化的建设问题也一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究竟要建立什么样的新文化,怎样建构新文化? 围绕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自觉的核心内容。在 30 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自觉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提出要建立既具有突出的时代性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的中国现代新文化,并形成关于现代新文化建设的“中国化”的思路,这些思考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形成和确立奠定了重要基础,也构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的重要思想文化背景。

一、文化的“民族性”与“现代化”问题的凸显

20 世纪 30 年代,由于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日趋高涨,对文化的民族性的高扬成为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界的一大主题。在 30 年代中期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战中,“建设中国本位文化”的提法因其对文化的民族性的强调引发了学者们的关注,在学者们对“中国本位”的多种阐释中,“中国文化建设必须切合中国现实国情、文化应具有民族特征”等开始成为人们自觉的认识。而论战中关于“现代化”的探讨,又使得人们对文化的时代性有了更为深刻的体认,使得人们在 30 年代中后期日益关注文化的民族性的同时,开始思考文化的民族性如何与时代性相适应。虽然马克思主义者们没有直接参与当时主要发生在国统区的这一文化论战,但论战中对“中国本位”“现代化”等问题的关注和探讨却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关于中国文化道路的探寻予以

收稿日期: 2017-06-20
作者简介: 李白鹤,女,湖北黄梅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 世纪上半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逻辑与文化意义研究”(13BKS013)。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63 页。

深刻启示。

1935 年 1 月,王新命等十位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拉开了中国本位文化论战的序幕。尽管这一宣言的发表有着呼应当时国民党开展“新生活运动”的政治背景,但是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现实背景下,《宣言》中对“建设中国本位文化”的倡导却因包含着对文化民族性的强调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宣言》的作者们批判了思想界曾盛行的全盘西化论,认为“全盘西化”会带来民族性的丧失,并由此提出要建设中国本位文化以保持民族性。全盘西化论者对此进行了激烈地反驳,并将中国本位论者主张的“中国本位”称为是对“中体西用”的延续。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的思想界围绕中国文化的出路究竟是“中国本位”还是“全盘西化”又或者是其他路径,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尽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非这场论战的直接参与者,但论战中的许多热点问题却一直在他们的关注之中,论战中的许多重要探讨也在这一时期给予马克思主义者以深刻启发,促进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文化观的进一步成熟。

首先,《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提出的“中国本位”之所以成为论战的一个焦点,就是因为“中国本位”带有对文化的民族性宣扬,也是对当时中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的一种回应。中国本位文化派提出警示,认为全盘西化会带来中国文化特征的消失,进而带来民族性的消失,因而他们宣扬“建设中国本位文化”,以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尽管西化派一再论述全盘西化不会带来对民族性的全盘抹杀,但他们的论证却未能消除人们的疑虑,论战中对文化的民族性的强调日益突显,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论战中都将文化的民族性与民族存亡联系起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东西文化论战中,中国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由于对唯物史观的把握有限,在突出强调文化的时代性之时,忽略了文化的民族性。而中国本位文化论战中文化的民族性问题的突显,无疑为此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更为全面的思考文化的古今中西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中国本位文化派以对文化的民族性的强调为依据,提出建设中国本位文化的主张,尽管他们本身并未能对什么是“中国本位”给出清楚的阐释,但在论战中还有其他许多关注文化的民族性、赞同“中国本位”这一提法的学者,根据各自关于中国文化发展的主张,对“中国本位”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在诸多的具体解释中,中国文化建设必须切合中国现实国情、文化应具有民族特征等内容常常被提及。这些探讨也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更深入地思考如何建设中国新文化的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

其次,中国本位文化论战中学者们对“现代化”的探讨,则使得人们对文化的时代性有了更为深刻的体认,也促使人们在 30 年代中后期日益关注文化的民族性的同时,开始思考文化的民族性如何与时代性相适应。在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中,西化派就曾提出东西文化间的差异是“古今之别”,是时代性的差异,认为西方文化已经进入了近代(现代)而东方文化仍然停滞在古代,所以西方文化是“近代文化”“现代文化”而东方文化仍是“中古文化”。之后,“现代化”一词也开始被使用。胡适在 1929 年所著《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一文中,就多次使用“现代化”一词,认为现代西方文明已成为世界文明,中国面临着如何在现代化世界里实现自我调整的问题。而在 1935 年 6 月的《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中,他又提出以“充分世界化”代替“全盘西化”的概念,并将此概念与“全力现代化”相并论。全盘西化派的另一代表人物陈序经在《全盘西化的理由》中则指出,欧洲近代的文化远比中国文化进步得多,西洋的现代文化是世界文化的趋势,所以,他认为“西化”一词,也就包含着“世界化的文化”和“现代的文化”之义。全盘西化派对“现代化”概念的使用和阐发也引发了论战中学者们对西方文化与现代文化、“现代化”与“西化”的关系等问题的关注。熊梦飞在 1935 年 6 月的《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闲天》一文中,也是将西方文化与世界性的文化、现代文化联系起来,他指出:“所谓西洋文化……可‘名正言顺’地唤作现代世界文化;我们之吸取所谓西洋文化,就是要使中国

现代化,要使中国成为世界队伍中之一员大将。”①在《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一文中,张熙若则对“‘西化’是否等同于‘现代化’”作了深入地反思:“西化差不多是抄袭西洋的现成办法,有的加以变通,有的不加变通。现代化有两种:一种是将中国所有西洋所无的东西,本着现在的智识、经验和需要,加以合理化或适用化……另一种是将西洋所有,但在现在并未合理化或适应的事情,予以合理化或适用化,例如许多社会制度的应用和改良。……若是有人愿拿‘现代化’一个名词包括上文所说的‘西化’,那当然也可以,不过不要忘记: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能包括现代化。”②

近代中国,在中国被西方枪炮打破大门,中国人又一时间无法从既有文化体系中找到应对现实问题的资源而只好将目光投向西方之时,一些中国人形成了视西洋文化为价值标准的观念,认为中国文化较之西方文化“不但物质机械不如人,而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③,并由此提出“西化”乃至“全盘西化”的主张。而 30 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战中学者们对“现代化”与“西化”的区分,则表明此时他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西方文化的优越并不因为它是西方的,而是因为它是现代的。尽管这时学者们对文化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努力方向和原则的探讨,还只是笼统、模糊的设想,但对当时人们探寻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思考中国的发展方向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启示。中国本位文化论战中关于“现代化”的探讨,对当时人们关于中国文化发展的思考最为直接的影响是:使人们对文化的时代性有了更为深刻的体认,使得人们在 30 年代中后期日益关注文化的民族性的同时,开始思考文化的民族性如何与时代性相适应。在此次论战结束不久后展开的新启蒙运动中,这种对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兼相强调,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就有着很明显的表现。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现代新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思考

虽然马克思主义者们没有直接参与主要发生在当时国统区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战,但随即在 1936 年,中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联合左翼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文化上的救亡运动”——新启蒙运动。1936 年 9—10 月,《读书生活》《新世纪》上先后发表的《哲学的国防动员》《论新启蒙运动》两篇文章正式发起了新启蒙运动的倡议。在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们看来,因为传统的思想文化仍有着强大的支配力量,而其中的某些糟粕又被敌人所利用,成为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因此要发动全民族的抗战,首先要把全民族从充满封建、奴化色彩的旧文化的桎梏和麻醉中解放出来,这是新启蒙运动的主要任务。此时,作为新启蒙运动的主力,马克思主义者们明确发出建设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号召,他们自称“新哲学者”,并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为理论基础,对文化与救亡的关系、文化与大众的关系、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建设中国现代新文化等问题做出了重要的思考。

新启蒙运动是一场文化上的救亡运动,新启蒙运动的发起者对该运动性质的这一界定,得到了新启蒙运动的参与者的广泛认同。然而,对文化与救亡的关系,新启蒙运动的参与者们的认识,相较于他们口中的“旧启蒙运动”也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发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深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伊始,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曾将文化问题摆在救国的首位,把文化问题的解决作为政治、经济等问题解决之基础。而在发起新启蒙运动时,马克思主义者们就曾明确指出,新启蒙运动作为文化上的救亡运动,是目前救亡运动中的一部分,“文化运动的联合战线运动是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联合战

---

① 熊梦飞:《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闲天》,载《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中册),罗荣渠主编,安徽:黄山书社 2008 年版,第 560 页。

② 张熙若:《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载《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中册),第 485 页。

③ 胡适:《胡适全集》第 4 卷,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67 页。

线基础上产生的,反过来,这文化运动又要用它的全力去帮助和推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联合战线,文化领域的实践的总动员,就是为要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①他们已经认识到,文化运动虽然是重要的文化上的救亡,但是文化运动并不是救亡的全部,文化运动是为配合社会政治、经济的要求而发生的,文化运动并不能代替社会的政治、经济斗争,而且要真正取得建设新文化的成果,必须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方面有着稳固的基础。

新启蒙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者们在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多次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也是文化上的群众运动,但它的广泛性有限,并没能真正地在广泛的民众中建立新文化,不能切实关联到大众生活中的许多最具体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对于文化落后的中国而言,迫切需要文化的大众化运动;新启蒙运动作为文化上的救亡运动,就是要建立大众的新文化,把民众从复古独断、迷信愚昧的精神生活中唤醒起来。在他们看来,在当时要发动全民族共同抗战、建立全民族抗日救亡的联合战线的背景下,文化的大众化特别是通俗化对于帮助广大民众正确理解联合战线的意义、启发广大民众起来共同抗敌救亡有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强调,文化的大众化不是空喊口号就能实现,需要扎扎实实的工作。为此,他们还提出了文化大众化的具体途径,比如,在工作方式上,由书斋里的个人工作转向面对工农大众,推进科学的民间化、教育的普及化、文学的通俗化等。

马克思主义者们在倡导新启蒙运动的文章中着重强调,由于中国旧文化中的某些内容被侵略者们所利用,成为他们用来奴役中国人民意识的工具,因此,继续对中国旧的传统思想作全面、系统的批判,阐发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文化侵略,揭示中国旧礼教如何转成帝国主义者麻醉中国人民的工具,这是新启蒙运动重要的文化任务。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们特别指出,新启蒙运动反对旧文化,并不像五四时代专为“打倒”一切传统,而是着重于在对传统的系统、全面的考察和批判中揭示其有毒的渣滓,彰显其尚有合理性和积极性的精粹,从而唤醒陷入虚伪礼教中的广大民众团结在民族解放的大旗之下,担负起保卫祖国的责任。艾思奇在《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中谈到,“封建残遗目前仍是最容易被敌人利用的东西,对于封建残遗的毒素,我们仍同样要抱着最大的警戒。但我们不需要五四以前那样单纯的反封建。就是封建文化的遗产或封建文化的代表者,倘若他能发挥出一定的美点,或者在爱国运动上有一点一滴的助力时,我们都可以接受它。”②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系统的批判,在扬弃中继承“中国最好的文化传统”,这是新启蒙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者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主张。

此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明确宣称,新启蒙运动作为文化上的救亡运动,就是要对抗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肃清封建奴化思想,以唤醒民众共同抗敌救亡。“目前思想文化运动是以抗敌救亡,民族解放为依归,以自由研究、自由发表、自由批判、自由讨论为前提,来发扬理性,说话做事,要有根据,广泛的深入的批判一切中国西洋的文化,以建立现代中国新文化的运动。”③围绕这样的任务,他们提出要在批判研究的基础上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好的部分和吸收西方文化中最好的成果,建立既具有突出的时代性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的中国现代新文化,以“使四万万同胞过着有文化,有理性的,光明的独立的精神生活”④。

那么,应当如何既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粹又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来创造中国的现代新文化,怎样建立兼具时代性和民族性的中国现代新文化?被时人称为“旧哲学界中倾向新哲学,而事实上不完全站在新哲学的立场的哲学家”张申府作为新启蒙运动的主将之一,他在新启蒙运动所提出的很多倡导也为马克思主义者们所赞同和接受。何干之在写于1937 年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中曾赞同性地引用张申府在《五四纪念与

① 艾思奇:《目前中国文化界的动向》,《现世界》1936 年第 1 卷第 1 期,第 9 页。

② 艾思奇:《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生活星期刊》1936 年第 1 卷第 19 期,第 5 页。

③ 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生活书店 1947 年版,第 224—225 页。

④ 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第 248 页。

新启蒙运动》中关于新文化的创造的一段论述:“如果说五四运动引起一个新文化运动,则这个新启蒙运动应该是一个真正的新的文化运动。所要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当然更不应该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一种真正新的文化的产生,照例是由两种不同文化的接合。一种异文化(或说文明)的移植,不合本地的土壤,是不会生长的。”①这里,外来文化必须本土化、中国文化建设必须切合中国现实需要、文化应具有民族性等已被视为建设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关键。

三、现代新文化建设的“中国化”思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尽管自 1937 年 7 月后,随着新启蒙运动的主将陆续离开当时的文化中心上海、北平而奔赴外地,新启蒙运动逐渐走向沉寂,然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们关于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发展思考却未就此停滞。在之后的数月内陆续发表的《现阶段的文化运动》《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抗战以来文化运动的发展》等文章中,开始出现了明确的关于新文化建设的“中国化”的主张,“要使我们的文化运动充分中国化……接受外国文化,是为要给中国本身新文化运动的推进得到一个好帮手。……一切真正民族的文化,都需要在我们今后更切实更深刻的文化运动中建立起来的”②。“新文化的民族化(中国化)和大众化,二者实是不可分开的。”③“我们欢迎古今中外一切人类的劳动的经验的结晶的世界文化,但我们同时提出我们要融化它,要中国化它。我们要求适合我们今日的生活的新文化,但同时我们提出继承我们最好的传统文化,发扬民族的固有的文化,保卫我们的民族文化。”④在这些论述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的文化“中国化”既包括外来文化的中国化也包括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即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立足于中国民众的现实生活,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和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建立民族的、大众的中国现代新文化。实际上,这一主张也可以看成是马克思主义者们对之前他们并未直接参与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战的回应,也可以视为他们对近代以来的东西文化之争提出了一个超越“复古守旧”、“全盘西化”的新思路——“中国化”:既不顽固守旧,又不盲目崇洋,既兼顾古今中外又强调批判地吸收,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建立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民族性的中国现代新文化。

上述的《现阶段的文化运动》一文在发出文化运动中国化的号召时,就曾以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为例,强调要将其种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不是反对接受优良的外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就可以说是在外国文化中接受过来的,然而不是生吞活剥的简单接受一个死东西,而是要把它种在自己土地上,使它适合中国的气候和营养条件”⑤。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实际上,在新启蒙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者们自称“新哲学者”,他们在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为指导思考如何批判旧文化、如何建设现代新文化时,对新哲学(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状况、未来任务、发展途径等也都作出了重要的论述。他们指出,在大革命失败后,经过革命的再生,新哲学在艰苦的历程中确立了自己坚固的阵地,新哲学的广泛传播已经成为不可抵抗的潮流;但是,新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新哲学者的注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的新哲学者们没能很好地将新哲学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比如,中国的新哲学者没能运用新哲学对中国的旧传统思想进行系统的批判,而中国旧传统思想中的糟粕正被帝国主义用以麻痹和奴役中国民众,而且中国的旧传统思想又是根深蒂固地与中国民众相联

---

① 张申府:《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认识月刊》1937 年第 1 卷第 1 期,第 66 页。

② 从贤:《现阶段的文化运动》,《解放》周刊 1937 年第 1 卷第 23 期,第 12 页。

③ 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战时生活》1938 年第 14 期,第 10 页。

④ 柳湜:《抗战以来文化运动的发展》,《战时文化》1938 年创刊号,第 11 页。

⑤ 从贤:《现阶段的文化运动》,《解放》周刊 1937 年第 1 卷第 23 期,第 12 页。

系着。他们强调,理论游离于实际往往会带来理论远远落后于实际,因此,对新哲学的阐释和运用应当和中国民族和社会的现实结合起来,应当面向中国的大众。何干之在《新启蒙运动与哲学家》一文中也指出,尽管进入 30 年代后,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被翻译成中文,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的工作也在进行,然而新哲学家们对新哲学的阐释和传播“仍跳不出原理原则的圈子。几年来中国社会的实践,反映在哲学论作中的从来就没有多少”①。何干之认为,“哲学不是莫测高深的冥想,而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方法与行动方法”,他强调,新哲学应当与现实实践密切结合,“必须把这一方法或大道理,应用于中国社会实际生活的各方面”②。可以看到,在新启蒙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者们已经深刻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与中国现实相结合、必须面向大众,并且还强调了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批判和研究在广大群众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思想。到了 1938 年 4 月,马克思主义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自觉,在艾思奇那里,凝聚成了“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这一号召。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③,他还指出这个运动的中心就是对新哲学、辩证法唯物论的研究。在当前学术界的研究中,艾思奇的这一号召被视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概念首次被明确地提出。1938 年 10 月,胡绳在《辩证法唯物论入门》前记中则具体地阐释了“辩证法唯物论中国化”的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于理论的叙述中,随时述及中国哲学史的遗产以及近 30 年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用现实的中国的具体事实来阐明理论,这应该是所谓‘中国化’的意义的另一面”。④ 1938 年 10 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提出了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毛泽东指出,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观察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以将其作为行动的指南,这是共产党员的必须着重致力的学习任务。但他紧接着强调,共产党员还应学习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即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并且,在学习马克思主义之时,要学会把它应用于中国具体的环境,使其在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这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论述,从文化方面来看,涉及的正是如何将来自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中国化”、如何处理这些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因此,这些论述也可看作是对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关于文化的民族性及其如何与时代性相适应的思考的总结。

可以看到,20 世纪 30 年代中后期,在中国本位文化论战的启示下、在对新启蒙运动的倡导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逐渐认识到,“中国现代新文化”应既具有突出的时代性,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正是在对“如何建设既具时代性又具民族性的中国现代新文化”这一问题的思考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逐渐形成了关于现代新文化建设的“中国化”的思路。作为来自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不但是中国革命实践的重要理论指导,也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思考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重要理论武器。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文化“中国化”的思路日渐明晰的同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应“中国化”的自觉也日益清晰。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文化“中国化”思路的形成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时的重要思想文化背景。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明确提出,又意味着“中国化”的思路已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们关于中国新文化发展之路的共识,在他们的这一思路中所蕴含的立足

---

① 何干之:《新启蒙运动与哲学家》,《国民(上海 1937)》1937 年第 1 卷第 13 期,第 293 页。

② 何干之:《新启蒙运动与哲学家》,《国民(上海 1937)》1937 年第 1 卷第 13 期,第 293 页。

③ 艾思奇:《艾思奇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87 页。

④ 胡绳:《胡绳全书》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61 页。

于中国的现实,立足于中国民众的现实生活,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和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建立民族的、大众的中国现代新文化等思想,无疑也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中关于新文化特征的概括、关于正确处理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原则等内容的提出和确立奠定重要基础。

四、文化自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和发展

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自觉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关于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思考的不断深入,从之前曾经在注重文化的时代性时忽略文化的民族性,到这一时期对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并重,并由对两者相适应的关注而提出新文化建设的“中国化”思路,显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文化的现状、发展目标和建设途径等认识的逐渐深化。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如何融入中国现实和中国文化的自觉也在日益明晰,并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命题和历史任务。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实质上可以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文化自觉的不断深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和发展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促进。

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新文化的思考中,他们不但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为指导分析文化与救亡的关系,既阐明文化运动对于救亡的重要性,又指出文化运动并不能代替社会的政治、经济斗争,强调要真正取得建设新文化的成果,必须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方面有着稳固的基础,并由此提出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立足于中国民众的现实生活,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和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建立民族的、大众的中国现代新文化;在此基础上,他们还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为例,指出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在当时中国的发展所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深刻阐明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与中国现实相结合、必须面向大众,并且还强调了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去批判地吸收在广大群众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思想。可以看到,正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为指导在对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和思考中,逐渐形成了关于现代新文化建设的“中国化”的思路,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形成和确立奠定重要基础;同时,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探索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他们对中西文化关系日益深刻的认识,也启发着他们不断深化关于如何更好地将来自西方的先进文化成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的思考,从而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日渐清晰的自觉和反思中不断推进中国新文化的建设、推进中国的现实实践。

当前,学界在谈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常常提到要深化两个“结合”,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个“结合”通常被认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现有成就的重要保证,更是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途径。对这两个“结合”特别是对第二个方面的“结合”的强调,显示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发展之间的联系的重视,这既是人们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作出的重要经验总结,也是人们在文化自觉中得出的重要结论。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具体途径和方式,在当前的讨论中却存在着一些分歧。有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一直是植根于中国文化的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的传统而生长壮大起来的。也有观点把这种结合视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基于实用目的进行的裁剪挑选。由此,在展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文化的当代发展时,这些观点的持有者们也相应地提出了带有文化复古主义或文化虚无主义等倾向的主张。因此,理清马克思主义在其中国化的历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文化的当代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实际上,在对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自觉历程的考察中,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时的思想文化背景的分析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相关重要分析。一方面,此时中

国马克思主义者们提出的关于新文化建设的“中国化”思路中既包括外来文化的中国化也包括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他们强调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和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建立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民族性的中国现代新文化。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早的明确提出者和倡导者们那里,他们就已基于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化发展之路探寻实践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既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重要理论武器,也是中国现代新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导。由此可见,此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已经明确阐明了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的重要原则: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必须融入中国文化,然而这种融入并非是原封不动地全然保存中国的既有文化,也并非是全然地摈弃中国传统文化或者实用主义地裁剪挑选传统文化资源,而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审视、扬弃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向,建设民族性和时代性兼具的中国现代新文化。对这一原则的遵循,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取得现今已有成就的重要保证。诚然,从目前中国文化发展的现状来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和改造还未完全完成,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尚有一些薄弱之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失败或不可能,而是恰恰彰显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中亟待继续努力的方面。因此,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构建立足当代实践和民众现实生活的现代新文化,这仍然是当前在新的历史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Marxists in the 1930s

Li Baihe

(*School of Philosophy*,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30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debate on China-based cultural construction under the illumination of the New Enlightenment Movement, Chinese Marxists came to realize that Chinese new culture should not only be modern culture, but also be national culture. They tried to find out how to construct Chinese new modern culture, and their idea about the sinicization of culture came into shape in the late 1930s, which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posal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Key words: debate on China-based cultural construction, New Enlightenment Movement, Chinese new modern cultur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责任编辑 刘曙光)